

旅游驱动下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

演变过程与驱动因素探究

——以湖南省湘西州竹山村为例

张家其 喻兴洁 张兴苗¹

(衡阳师范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2)

【摘要】: 基于压力反应和社会冲突理论, 运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理论框架, 并以典型民族传统村落湖南省湘西州竹山村为案例地, 分析其人居环境演变过程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 旅游起步阶段, 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处于量变积累阶段; 发展阶段, 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处于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键阶段; 形成阶段, 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在良性压力下实现质变。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是各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响应的结果,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与村民共同作用, 再到各主体协调, 是人居环境系统实现优化重构和民族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关键词】: 民族传统村落 人居环境 压力-状态-响应模型 竹山村

【中图分类号】: F323.22; F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8141(2022)04-0426-09

0 引言

近年来,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以追求田园生活、释放生活压力为目的的乡村旅游成为居民旅游新热点。尤其是具备高度要素完整性、显著民族特性和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 依托其浓厚的特色民族文化和特色建筑, 借助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或战略的实施, 将旅游产业与教育、科技、文化等产业联动发展, 成为实现民族传统村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在旅游开发背景下, 各种旅游要素的涌入, 使民族传统村落由封闭向开放演变。但不容忽视的是, 民族传统村落旅游资源既具有原住民占有性、典型地域性, 又具有居民参与性和游客互动性, 导致旅游开发不仅影响居民的居住环境, 对传统生活空间造成倾轧, 还导致居民放弃传统生产方式, 这对居民的价值观、社会关系、文化传承造成了深刻影响。旅游产业的发展对民族传统村落生态、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不断加深, 导致人居环境系统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 为适应影响带来的变化和缓解其压力, 各主体通过转变响应行为使人居环境系统发生波动与演变。由此可见, 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与其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因果关系^[1], 旅游开发背景下开展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过程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在乡村旅游大热的背景下, 众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开展了大量研究。现有研究一方面聚焦城市人居环境演变, 尝试从不同角度剖析城市化、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演变关系^[2,3], 并分析人居环境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4,5]; 而面

¹**作者简介:** 张家其 (1986-), 男, 湖南省醴陵人,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研究。喻兴洁 (1997-), 女, 湖南省长沙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研究。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编号: 20A061);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编号: CX20211253)

对旅游开发给人居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通过分析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认为其适宜度与城市发展水平相关,应注重各自“类”的比较优势,加强互动^[6]。另一方面,相关学者重点探索了乡村人居环境的驱动机制和演变机理^[7,8],开展了乡村人居环境优化的实践探索,认为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旅游资源要素配置、土地利用方式和空间重组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演化的关键因素^[9];但大量游客涌入带来的乡村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压力加速了社会分化^[10],使其人居环境向主客共享趋势转变^[1],并对乡村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再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1]。上述研究虽然从整体上分析了系统演化的复杂性和主体适应性的关系,但是难以描述和预测主体的行为细节,而乡村社区在变迁过程中存在物质能量循环和信息交流,其主体能够运用调控功能,以维持社区动态平衡与相对稳定^[12]。基于此,本文借助压力反应和社会冲突理论,结合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人居环境演变理论框架,开展典型民族传统村落实证研究。

1 竹山村旅游开发现状

竹山村位于武陵山南脉的湖南省湘西州凤凰县麻冲乡东部,是一个纯苗族聚居村,分为竹山、大坨、栗木、岩洞4个自然寨,森山覆盖率达98%以上,老树参天,石梯铺路,生态环境良好。该村落历史悠久、民风纯朴,拥有竹山苗寨、青石云梯路、吴家大院、苗王邀文石等众多特色苗族文化景点,其地域特色旅游资源具有历史性和唯一性,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2015年以前,竹山村由于交通闭塞、山路崎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问题,旅客数量较少,政府、村民无法将旅游开发强度有效控制在人居环境可承受范围内,引起生态破坏、人口流失、社会变迁、民居损毁、设施落后等问题。2019年,当地政府利用乡村经济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引入凤凰县旅游投资公司打造凤凰苗乡旅游“一带一路”的“产业·旅游”线路产品,并将旅游产业与村民生活品质化建设进行融合发展,使其社区转型为宜居、宜业、宜游的人居环境空间。竹山村从贫困村发展为文旅融合产业度假村,相继获得“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称号,是民族传统村落依托旅游产业实现人居环境转型的成功案例。因此,选择竹山村作为案例地,有利于归纳在旅游驱动下民族传统村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保护的经验和,加速民族传统村落乡村振兴进程,促进民族传统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2.1 压力反应和社会冲突理论阐述

20世纪以来,压力反应和社会冲突理论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研究。“压力”是人们心理和精神在面对工作、人际关系和个人责任等要求时的紧张状态,常被称为“应激”和“紧张”^[13]。^[14]Cannon认为,面对某些外部压力时,机体原有内部环境的稳定状态会被打破,但通过缓冲系统和反馈机制又会使内部环境恢复成原有的稳定状态,即内稳态过程。20世纪30年代,^[15]Selye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压力反应理论——“全身适应综合征”(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GAS),用于解释当机体内稳态受威胁和扰乱后,其出现的一系列适应性反应过程,并根据反应状态分为警觉期、抵抗期、衰竭期3个阶段。“冲突”是当地社会矛盾无法调和下居民所采取的极端应对方式^[16]。社会冲突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齐美尔,他认为社会冲突就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之一^[17]。社会冲突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L·科塞指出,社会冲突是排泄敌对和进攻情绪的主要渠道,能使社会压力得到释放,社会冲突得到缓解^[18]。随着压力和冲突理论的逐渐完善,学术界开始关注群体压力产生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并对其疏解和消解进行了探讨,如家庭压力与反应的ABC-X模式^[19]、旅游地社区居民的冲突应对方式模型^[20]、基层治理行为逻辑的弹簧模型^[21]。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压力及其冲突疏解的研究以归纳性现象描述研究为主,缺乏对压力疏解主体的冲突响应行为的系统研究。

因民族传统村落在生产生活、旅游功能的共域性,民族文化体验的深度交互性,使得人居环境演变过程中容易产生敌对情绪^[20]。为此,本文采用Selye压力反应和齐美尔社会冲突理论相结合的方式,探讨社区压力—冲突在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中的应用,并提出以下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支撑的命题:(1)命题1——压力与冲突是民族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由于民族传统村落地处偏僻,其异域文化具有特定的空间属性和文化特质,极易被强加于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偏见,导致外来资本主体与本地居民在文化价值观、资源权属、土地所有权等方面产生冲突,这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

现象^[16]。(2)命题 2——民族传统村落各主体通过冲突响应行为释放和宣泄对立情绪，从而达到缓解压力和满足各自旅游诉求。当利益分配不均时，主体对各种压迫性事件不做抵抗和响应，其社区压力就会上升；积极抵抗和冲突响应有利于主体分散注意力、减轻压力和满足需求^[19]。(3)命题 3——旅游背景下，民族传统村落社会冲突分为良性冲突和恶性冲突^[18]。良性冲突能在满足各主体诉求的基础上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使其人居环境得到改善，而恶性冲突会引起人居环境系统陷入耗竭之境。(4)命题 4——社会冲突能为民族传统村落重建社会关系和提高社会整合度提供突破口^[17]。在旅游驱动下，原有的社会关系因为生产方式、收入差异发生改变，通过居民的冲突响应能完善规范和制度，以此重构新的社会关系，进而缓解各主体压力，并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和社会约束力。

2.2 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主体应对压力的冲突响应行为对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产生的影响，以及人居环境演变通过何种机制改变压力及其冲突响应行为，即探讨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与旅游产业活动行为的驱动机制。人居环境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系统阐述人居环境各阶段压力、响应、状态特征需要考虑自然、人类、社会、居住和支撑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表 1）^[22]，运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23]能在同一研究框架下描述人居环境演变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冲突响应行为，并系统分析人居环境演变过程中压力、状态和冲突响应调控之间的关系。基于此，在压力反应和社会冲突理论基础之上，本文运用 PSR 模型有助于构建人居环境演变框架，揭示人居环境系统与旅游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影响，较全面地表现各主体冲突响应行为的反馈机制，进而总结旅游驱动下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过程机理。2021 年 3 月，调研组在竹山村采取深度访谈、小组交流和实地观察等方式收集一手数据，通过村落规划、制度文本、新闻采访和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收集二手数据，基本掌握了竹山村旅游产业发展及其人居环境演变的详细数据。

3 竹山村人居环境演变过程探究

旅游开发背景下，政府、企业、居民等参与主体由于本能、情绪、利益与社会认知的不同，它们在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经济诉求与利益分配、资源权属变动与管理等方面也存在感知差异。受这种感知差异影响，当各主体面对生产生活的直接或潜在威胁时，表现出的冲突响应行为会出现偏差。在此基础上，各主体基于主观能动性采取积极或消极程度冲突响应行为减缓压力和冲突状态，进而加速人居环境演变，影响民族社区人居环境演变方向及其发展前景，且当前的人居环境状态会影响下一阶段的感知压力与压力冲突响应。

竹山村早期发展条件差、旅游品牌知名度较低，既面临着外部招商引资困难，同时又因居民文化素质不高、市场意识不强等问题，内在发展动力不足，最终更多地依靠政府政策来推动村落发展。由此可见，政府政策的支持程度直接影响到当地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进而对当地人居环境产生影响。因此，依据竹山村历年政府政策和招商引资情况，根据主体的冲突响应行为，将该村人居环境演变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形成阶段（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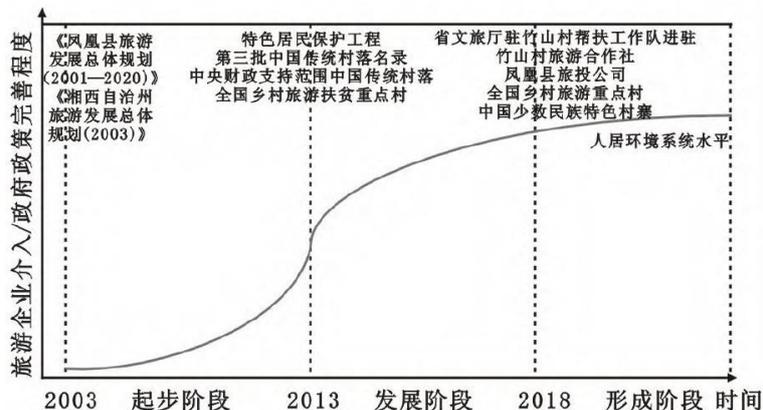


图 1 竹山村人居环境演变阶段划分

3.1 人居环境量变积累阶段

该阶段竹山村通过政府旅游政策响应和村民被动参与的方式对人居环境系统构成影响，但行政指令式的开发引起了局部生态恶化、价值观冲突、景观基因消失等一系列变化，人居环境系统原有平衡被打破，且各主体压力与冲突响应行为作用于人居环境系统的强度有限，其人居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处于量变积累阶段（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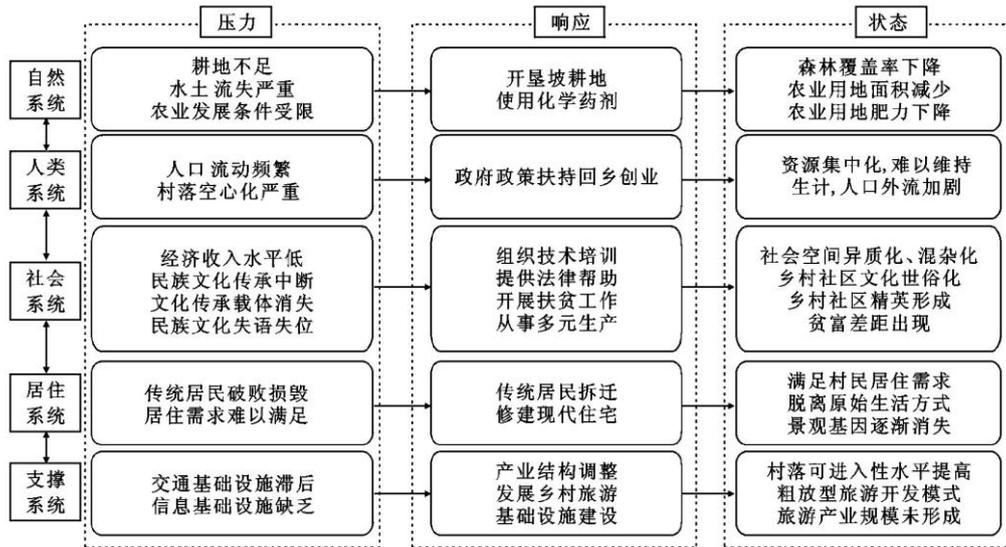


图 2 竹山村起步阶段人居环境演变过程

压力：(1)竹山村因地处山区，人多地少、耕地不足，农业发展条件受限，农户常年人均收入不足 1300 元，迫于经济压力，村民大多外出务工，造成村落空心化，留守儿童与孤寡老人问题突出。(2)青壮年人口的外流导致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失去载体，且人口频繁流动造成外来文化与本土乡俗相互碰撞，民族传统文化、习俗观念逐渐处于失语和失位状态。(3)因资金缺乏、人口流失，导致民族传统民居长期失修，漏雨、发霉、腐朽垮塌等破败现象频出。(4)该村落还存在公共服务设施滞后，交通可进入性较差，对外通讯困难等问题。

响应：(1)为了满足粮食需求，村民大量开垦坡耕地和使用农药化肥，以此提高耕种面积和农产品产量。(2)受《凤凰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湘西自治州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推动，加之老洞村旅游乡村示范效应，竹山村于 2003 年投资 600 万元建设竹山渠道和千麻公路，并利用当地独特的苗族文化、良好的自然环境与凤凰古城辐射效益发展乡村旅游。(3)在村落旅游开发背景之下，部分务农或务工村民通过政府培训，积极响应政府扶贫政策，开展农业为主、旅游为辅的多元生产。其中，获得较高收入的村民转变为乡村社区精英，在处理村内事务时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4)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为满足其居住需求而“拆旧建新”，村落出现了大量的新建住宅。

状态：面对上述压力，在各主体反应下，竹山村自然、人类、社会、居住、支撑系统发生异变，具体表现在：(1)林地、耕地和水域被建设用地替代，且村民大量使用化学药剂，造成耕地大面积减少、土壤肥力下降等局部生态破坏和环境资源消耗问题，导致游客向往绿水青山的诉求难以满足。(2)信息和社会资源仅掌握在少数精英农户手中，从事旅游产业的普通村民难以维持生计而重新转向务工或务农，人口外流加剧。(3)农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虽然使农耕田园生态和村落可进入性得到提升，保障了乡村旅游的起步和发展，但是崇尚传统农业的留守者与接受旅游文化的创业者在民族文化价值认同上存在明显分歧，文

化冲突频发。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以亲缘和地缘维系的社会关系逐渐被业缘、志缘和外缘关系取代，社会空间呈现异质化和混杂化。(4)民族民居逐渐被城市建筑代替，村民的居住需求虽然得到了满足，但是难以满足游客对传统建筑参观与民族文化体验的诉求，游客数量和产业规模受到影响，收入大幅度下降。

3.2 人居环境量变到质变关键阶段

该阶段，竹山村通过政府加强制度治理和村民民主协调的方式推动了该区旅游发展。随着竹山村实施《特色民居保护工程》政策，并相继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政府和村民通过金融、教育、建设等手段基本夯实和积淀了旅游产业发展基础，人居环境系统处于量变向质变转型的关键阶段（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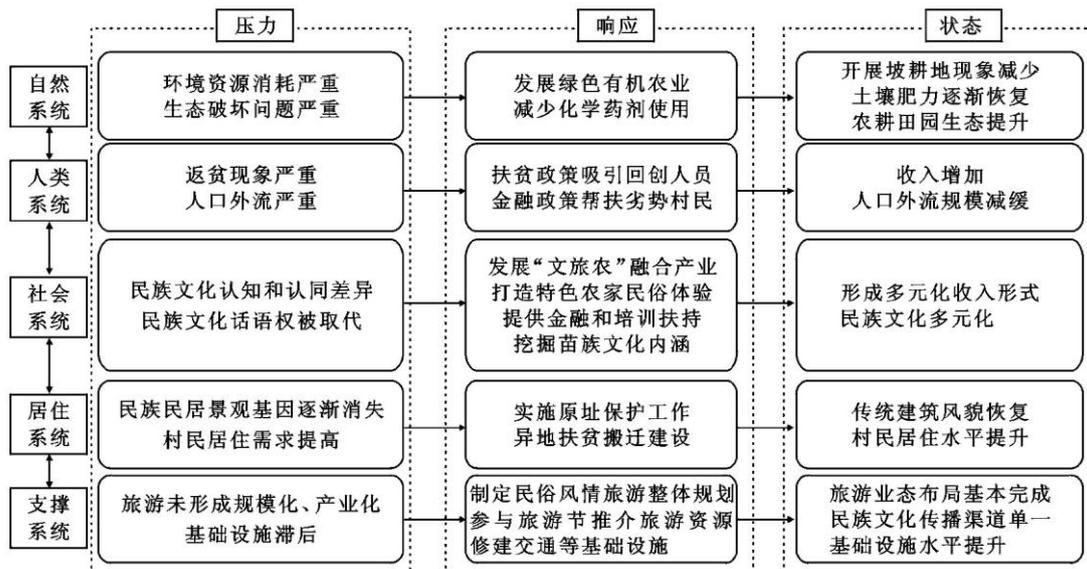


图3 竹山村发展阶段人居环境演变过程

压力：(1)粗放型旅游开发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且旅游产业规模较小，村民年均收入不足1800元，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人口外流严重。(2)竹山村巫傩文化、苗族古建、农耕小戏等民族文化遗产特色鲜明，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和“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成为凤凰县发展乡村旅游和打造长潭岗国际旅游度假区的节点村寨，但因发展动力不足，作为民族文化传播载体的寨老和原住民失去话语权，造成旅游开发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的片面曲解。(3)村民与游客对原真性民族文化存在认知偏差，村民认为“拆旧建新”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杂糅与协商，但游客则认为此举丧失了竹山村的地方特质。(4)山路崎岖、交通闭塞、信息匮乏，加之粗放型旅游开发模式，难以扩大该村旅游产业及其相关产业规模。

响应：(1)为解决生态破坏问题，竹山村围绕生态乡村旅游，发展绿色有机农业，以此改善生态环境，同时在山江—老洞—竹山民俗风情旅游规划下，该村投资399.1万元实施“银行-融资平台-企业-农户”模式和人才培养计划，修建千云公路，异地搬迁房屋，对133栋特色民居和青石板户间道实施原址保护工作。(2)为增强盘活存量，避免同质化发展，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民族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和生产性保护，打造特色农家民俗体验，并深入挖掘当地苗族文化内涵，开展湖南省秋季乡村旅游节，推介苗族旅游资源和产品。

状态：(1)绿色有机农业的发展，使开垦坡耕地现象逐步减少，土壤肥力逐渐恢复，农耕田园生态得到恢复。(2)在扶贫政策吸引下，大批中青年劳动力回乡创业，部分村民通过金融政策扭转了在旅游生计中的劣势地位，返贫现象减少，人口外流规模也

逐渐减缓。(3)旅游业态布局、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规划和修建工作的完成,夯实和积淀了旅游产业发展基础。(4)特色民居保护工程和农家民俗体验的开展,既保护了民族传统建筑风貌,又满足了村民的居住诉求,并形成多元收入形式,但苗族文化传播渠道的单一性和游客对地方特质认知的渐进性,导致游客难以对现代性与民族性杂糅的民族民居、民族文化产生地方认同。

3.3 人居环境质变阶段

该阶段,竹山村通过政府包容性治理、企业资本输入、村民社区营造等协调发展的方式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提升旅游品质。竹山村根据人居环境状况实施“以文化人、以旅兴村”的旅游开发计划,引入旅游企业资金,开展局部生态恢复,推动空间功能转变及提升民族文化原真性,使其人居环境系统在良性压力下实现质变(图4)。

压力:(1)竹山村相继被列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旅游名气迅速上升,但生态环境难以承载日益上涨的游客数量。(2)游客因异域文化认同差异,极易对原住民的文化、经济产生偏见,造成本地弱势居民难以融入逐渐开放的乡村社区,并伴随居住空间倾轧、邻里关系改变、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3)该村缺乏专业化运营公司管理,存在投诉无门、厕所损坏等技术性和功能性质量欠佳问题,致使其旅游服务质量难以满足游客对体验式旅游的需求。

响应:(1)为提升旅游环境容量,竹山村引进资金800万元,邀请规划公司编制《竹山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并修建生活垃圾处理、污水无害化处理、生态停车场、旅游厕所等旅游公共设施。(2)为提升村民地方认同感和经济收入,制定《村规民约》等非正式管理制度,建立优质油茶等农业产业园,开展盘活闲置特色民居工程,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文旅产业开发。(3)引入凤凰县旅投公司,推行“公司+村集体+合作社”发展模式,开展智慧乡村旅游工程,立足于山水、民情、民俗资源,投入3000万元推出“爱在竹山”沉浸式体验区、苗岭无边界温泉泳池和竹山乡居3大旅游产品。

状态:(1)竹山村通过修建旅游公共设施和开展卫生环境整治工作,使该村的环境容量得到有效提升。(2)该村弱势村民受非正式管理制度和教育培训的影响,重塑了传统观念,提升了道德素质和公共精神,提高了合作程度,进而积极参与民宿产业和特色农业开发。其居住空间由单一生活功能向生产生活多元功能转变,形成了以旅游产业为主,务农或务工为辅的收入形式,进而逐步适应开放的乡村社区。(3)新型旅游发展模式的实施,既让游客在民俗活动中感受到民族性,又让原住民在参与民间工艺中实现了就业,并增加了他们的收入。2019年,竹山村人均纯收入增长到12600元,民族文化传播话语权在参与过程中逐渐回归。(4)旅游规划的制定、旅游设施的建设、旅游产品的推出和互联网技术的运用,改善了竹山村的软硬件水平,使该村旅游标准化体系和旅游品牌逐渐建立和打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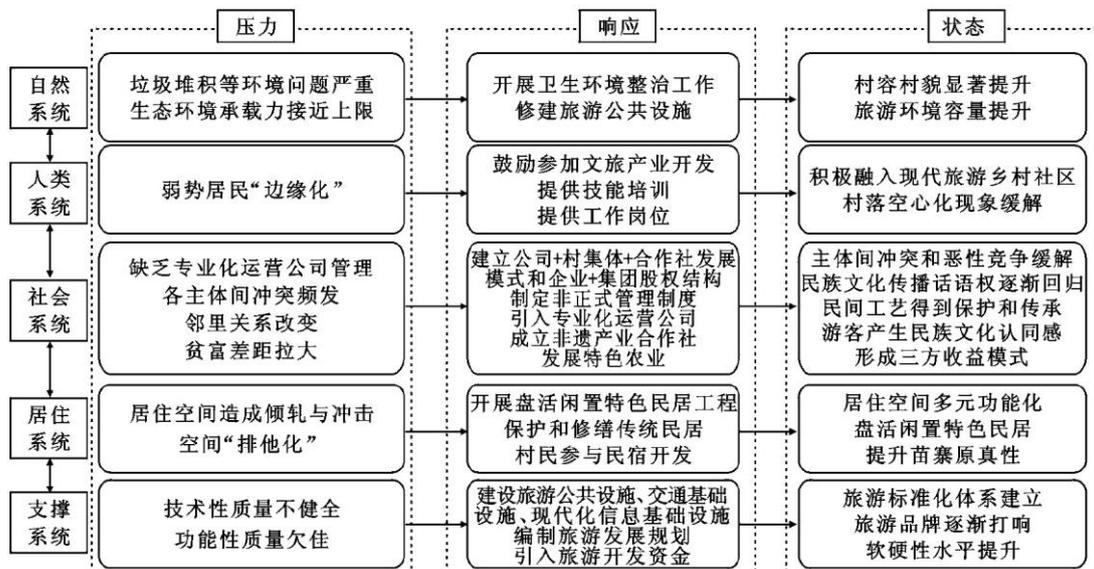


图 4 竹山村形成阶段人居环境演变过程

4 竹山村人居环境演变因素探究

早期竹山村根据旅游发展规划政策，借助当地独特的民族文化、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凤凰古城的辐射效应，带动村民发展以凤凰古城为核心的观光旅游和文化旅游；但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缺乏多样化的冲突化解机制与制度平台，造成开发主体常常无法有效处理冲突，引起自然环境破坏、人口外流加剧、乡村文化世俗化、传统民居破败损毁、旅游设施建设等人居环境系统异变等问题，对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威胁。在此背景下，为缓解人居环境改变产生的压力，政府加强制度治理，制定旅游规划和保护传统民居，并引导村民生计方式转型，使人居环境系统出现自然环境恢复、人口外流减缓、民族文化现代化等良性变化；但人居环境供给难以满足主体日益上涨的旅游发展需求，且主体间利益、价值观冲突日益凸显。面对新压力，该村通过政府包容性治理、旅游企业专业化管理、村民社区营造等多元主体协调发展方式提升村容村貌、缓解空心化现象、形成新型社会结构、推动空间多功能化、建立旅游标准化体系，人居环境系统发生巨变。上述演变过程表明，竹山村不同阶段人居环境演变动力存在差异，但前后动力间存在逻辑关联，其演变驱动因素主要由区位、市场、村民、政府等组成（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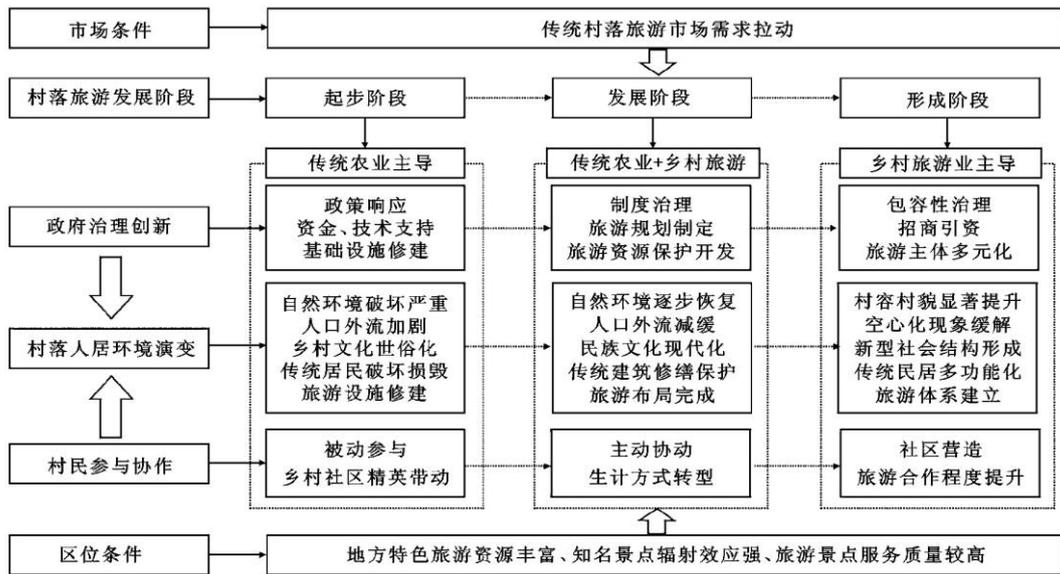


图 5 竹山村人居环境演变驱动因素

区位条件是竹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前提和基础。竹山村苗族文化景点丰富，周边优质旅游景点数量较多、质量较高，旅游区位优势。该村因地制宜，利用地域文化的延续性、永续性、创造性和增值性，深入挖掘、传承和再生产当地民族文化遗产，形成了一条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文化产业链，进而促进了民族文化价值增值和符号化建构，并借助凤凰古城的辐射效应，吸引了大量游客体验以原住民为载体的原真性民族文化。同时，旅游服务示范户、长潭岗“两桥一路”、村道提质维修改造和进村公路等旅游业态布局、公共和交通设施的设计和建造，降低了游客的出行时间成本，提高了游客的景区体验感，提升了竹山村旅游景点服务质量。

传统村落旅游市场需求的扩大是竹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外部动力。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的乡村旅游成为城镇居民旅游新热点。然而，相较于对聚落空间形态与传统建筑保护性开发重视的传统村落，民族传统村落还有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传承的功能目标，其经济空间重构、旅游空间再造、村落文化适应与其他村落存在差异。在这一背景下，竹山村凭借独特的区位条件，以周边知名景点和旅游乡村为依托，大力发展民族传统村落旅游产业。

截至 2020 年底，竹山村年接待游客 22 万人次，实现旅游年收入 1173.2 万元，逐步从传统农业村发展为文旅融合产业度假村。

政府治理机制创新是竹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关键动力，直接决定利益相关主体是否有意在当地投资旅游及其相关产业的强度。起步阶段，政府响应旅游政策，主动为经营旅游产业的村民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保证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发展阶段，政府为提升旅游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不仅对竹山村进行了旅游产业布局规划，还对停车场、道路等基础设施和传统文化、民族民居等文化遗产进行了改造和保护，为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夯实和积淀了基础；形成阶段，通过引入旅游企业，提升旅游建设管理水平，并通过包容性治理形成对各利益主体的规制和约束，增强了乡村社区治理的参与性和公平性。包容性治理是各主体力量共同作用下的“合作秩序”^[24]，强调各利益相关主体均衡发展^[25]。竹山村逐渐形成以村民为本的多元主体相结合现代化治理结构，保障了各相关主体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和利益共享，有效防止了乡村社区贫富分化和阶层分化，进而促进了乡村社区的公共性建构，增强了村民的地方归属感。

村民参与协作是竹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内部动力。竹山村人居环境演变不仅是政府自上而下制度治理的结果，也是村民自下而上参与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结果；村民既是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乡村旅游产业中重要的参与者。起初少数具有经济嗅觉的村民成为乡村社区精英，带动当地村民向乡村旅游方向进行产业转型，此后为追求最大经济利益和现代生活，村民不断从传统农业向乡村旅游业转变，推动竹山村产业结构多样化、社会结构现代化和空间结构多功能化，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也因此得以实现。村民参与协作建立在现代化政府治理制度结构上，村民在参与旅游开发过程中获得了协商议事的机会，并获得了政府、企业的回应，进而激发了村民对参与旅游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行动力和责任感，强化了民族文化主体认同感，营造出体验式民族文化氛围。村民在政府公共性建构和村规民约等非正式管理制度下，重构了社会关系网络和价值观念体系，以适应逐步开放的乡村社区。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压力反应和社会冲突理论，运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了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理论框架，并以典型民族传统村落竹山村为案例地，分析了其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和驱动因素，结论如下：(1)从压力反应和社会冲突理论视角来看，由于各利益相关主体存在感知差异，使得人居环境不同阶段感知压力、冲突响应及过程状态也存在较大差异。人居环境演变压力主要表现在旅游开发背景下人居环境系统供给与乡村社区各主体需求间的冲突，包括生态破坏、人口流失、社会关系淡化、传统建筑开发保护、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压力；人居环境演变冲突响应是乡村社区各主体调整压力的措施，主要包括政府制度治理、村民能动性参与和旅游企业营销投资等响应行为；人居环境演变状态是乡村社区压力与冲突响应的结果，包括：生态环境破坏或恢复，人口流动加剧或减缓，社会结构失调或优化，居住水平下降或上升，管理服务质量降低或提升等。(2)竹山村人居环境的演变过程揭示了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划，还应进行自下而上的内生式发展，其人居环境演变是各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响应的结果。从起步阶段的政府主导到发展阶段的政府与村民共同作用，再到形成阶段的各主体协调是人居环境系统实现优化重构，民族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3)竹山村人居环境演变驱动因素由区位条件、政府治理机制、旅游市场需求和村民参与协作等组成，区位条件是演变的前提和基础，政府治理机制创新是演变的关键动力，传统村落旅游市场需求的扩大是演变的外部动力，村民参与协作是演变的内生动力。

5.2 讨论

竹山村旅游开发是将整个社区作为旅游生产空间，依靠社区资源使其人居环境获得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发展。此模式不仅利用物质资源加强村落经济权能的建设，还利用社会文化资源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了社区的“经济性”“乡村性”和“民族性”，促进了民族社区多维人居系统与价值功能的重构，这是旅游开发过程中民族传统村落平衡“传承力量”与“变革压力”的一次尝试和突破。但民族社区拥有的旅游资源、社会资本及其可承受的人居环境变化强度具有差异性，竹山村人居环境转型是

在特定区位、经济、文化等条件下主体压力产生和冲突响应行为的结果，具有本地性和复杂性。因此，竹山村人居环境演变模式具有一定借鉴性，但不能作为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的普遍模式。

从目前民族传统村落开发现状来看，部分村落缺乏对地域民族文化的汇聚凝练，盲目照搬成功民族传统村落旅游地的发展模式，出现了民族文化符号仿制化、民族遗产形式模式化、民族旅游产品趋同等恶性趋向，使民族传统村落在建设过程中遭遇不同程度的文化危机^[1]。同时，部分地方政府与村民发展心情迫切，一味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其结果是旅游产业带动社区经济发展效果不显著，且忽视了对前期良性冲突的管控，当后期冲突恶化时难以有效预警和调控，造成生态破坏、人口流失和文化失传等一系列问题，使其人居环境遭到极大破坏。此外，民族传统村落的根基源于乡村性和民族性，地域民族文化是村落具有生命力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民族传统村落应制定符合当地现状的旅游开发模式，建立冲突预警和管控机制，注重民族文化的符号化建构与价值再生产，突出地域民族文化异质性，营造民族文化旅游氛围，提升民族文化认知和认同。

在旅游驱动下将经济效率低、效益差的农牧业转变为资源变现快、附加值高的旅游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民族传统村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普遍趋势，但因民族旅游供过于求，部分进入旅游衰退期的民族传统村落村民难以通过其他产业维持生计，常引发家庭生计、社会关系、文化认同等新冲突。例如，广西平安寨就因过度旅游化抑制了农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村民在旅游产业进入衰退期时难以利用发展严重滞后的其他产业支撑生活，出现贫富分化、文化断层、民族文化凝聚力瓦解等问题^[10]。此外，压力与冲突是民族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冲突是民族社区保持平衡的重要机制。因此，应形成多样化生计结构，将农牧业等旧生计视为应对压力的冲突响应调控措施，而非恶性压力，并高效利用良性冲突，发挥正向作用，提前预警和识别恶性冲突，管控其负向作用。

在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过程中，以旅游开发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本身即是最大的感知压力，如不能处理好旅游系统与人居系统的关系，村落会逐渐演变为“风险社区”^[10]。竹山村通过建立以村民为本的多元主体相结合现代化治理结构，及时预警压力和控制冲突响应强度，使旅游系统与人居系统相平衡。因此，民族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应实行多元主体相结合的治理制度，控制感知压力与冲突响应强度在人居环境可承受范围内，以实现民族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鄢方卫, 杨效忠, 舒伯阳, 等. 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过程与机制研究——以徽杭古道为例[J]. 旅游学刊, 2019, 34(10): 93-105.
- [2] 祁新华, 程煜, 陈烈.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动力机制[J]. 经济地理, 2008, 25(5): 794-798.
- [3] 李雪铭, 张春花, 张馨. 城市化与城市人居环境关系的定量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4, 14(1): 91-96.
- [4] 蒋旭, 蔡运洁. 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时空演化[J].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9, 29(4): 45-48.
- [5] 郭政, 姚士谋, 陈爽, 等.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水平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40(2): 79-88.
- [6] 谷永泉, 杨俊, 冯晓琳, 等. 中国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空间分异研究[J]. 地理科学, 2015, 35(4): 410-418.
- [7] 李伯华, 曾灿, 窦银娣, 等.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677-687.
- [8] 曾菊新, 杨晴青, 刘亚晶, 等.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及影响机制——以湖北省利川市为例[J]. 人文地

理, 2016, 31(1):81-88.

[9]杨兴柱. 基于城乡统筹的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建设[J]. 旅游学刊, 2011, 26(11):9-10.

[10]唐晓云. 繁荣遮盖下的旅游地社会分化兼论民族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J]. 旅游学刊, 2014, 29(4):10-11.

[11]陈水映, 梁学成, 余东丰, 等. 传统村落向旅游特色小镇转型的驱动因素研究——以陕西袁家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20, 35(7):73-85.

[12]叶峻. 从自然生态学到社会生态学[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3):49-54, 62.

[13]Seaward B L. 压力管理策略: 健康和幸福之道(第五版)[M]. 许燕,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8:3-27.

[14]Cannon W B. The Wisdom of the Body[M]. New York: W W Norton, 1932:1.

[15]Selye H. A Syndrome Produced by Diverse Nocuous Agents[J]. Nature, 1936, 138:32.

[16]蔡克信, 潘金玉, 贺海. 利益、权力和制度: 旅游社会冲突的成因机制[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4(1):48-55.

[17]苑国华. 齐美尔的社会冲突思想新论[J].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1, (1):85-87.

[18]L. 科塞. 社会冲突的功能[M]. 孙立平,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19]Price S J, Price C A, McKenry P C. Families & Change: Coping with Stressful Events and Transition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Inc, 2010:1-24.

[20]张大钊, 曾丽.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应对方式理论模型[J]. 旅游学刊, 2019, 34(2):29-36.

[21]谢正富, 赵守飞. 弹簧模型: 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的一种分析框架[J]. 求实, 2015, (2):71-81.

[22]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1-200.

[23]Robert E, Bowen, Cory R.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and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J].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2003, 46(3-4):299-312.

[24]李增元. 合作秩序与开放性、包容性治理: 当代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J]. 社会主义研究, 2012, (6):102-107.

[25]李烁, 曹现强. 以包容性城市治理推动城市转型发展[J]. 行政论坛, 2018, 25(4):76-84.